

編 序

連結「人」與「人」的人類學者 馬淵東一

作為一名戰後在日本與國際學界知名的社會人類學者馬淵東一 (Mabuchi Toichi, 1909~1988)，說起來很難讓人置信，他不僅沒有光鮮的學歷，既無碩士，也沒有博士學位。甚至生前一直到退休，連一本單行本著書也沒有出版過。但他的學問卻是那麼好，讓學界同儕與後輩佩服不已。他自己也覺得實在太說不過去了，就在學生們極力促使之下，終於將自己到六十五歲累積的研究論文，編輯成三大卷的《馬淵東一著作集》出版（社會思想社，1974，以下簡稱《著作集》）。

通常這類以全集形式的著作，出版後該學者的學術生涯大概也告一段落，可稍事休息。偏偏這位人類學者如馬拉松健將，寫完編輯〈後記〉，隔天就出發去遠方的印尼諸島進行田野工作，並持續生產高品質論文，在更高難度的國際學界發表。是以相隔十四年後，又有《著作集》「補卷」之集成產生，把過去多篇英語論文翻譯回日本國內，雖然同樣精彩，不過「補卷」製作時，體力已無法負荷，最後由他的學生小川正恭全力編輯，並於馬淵逝世後的當年出版。

因此，本卷雖然是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翻譯成中文四卷系列作之中，算是第三卷，對出版物嚴謹毫不妥協的馬淵東一來說，事實上本卷才是他自行編輯，修整完成的最後一冊「壓卷之作」。

讀者會發現，四卷的編排各具巧思，每卷論文都涵蓋了馬淵三個田野地：臺灣、印尼與沖繩，外加對歐美新知學術史介紹、序言或導

讀等其他文章，閱讀起來不感覺枯燥，也不至於集中一地。如果太集中一地，遇上對該地區沒有興趣的讀者，豈不是會跳過不讀？那就看不到馬淵如何出入這三大田野地，在他一生長跑的社會文化思想運動中，對於曾深入研究過的眾多族群文化給予對比·類比的精彩處，豈非可惜？因此，《著作集》每卷的比重都拿捏分寸，加上對國際人類學界的介紹，讓讀者在每一卷都可找到有趣的主題，也可體會到馬淵在他的時代，引領日本社會人類學風潮而自成一家的思想結晶，從而觸發後人對該學問更多興趣。這應該是作者對前三卷，做了如此編排的道理。

本書作為原本預定三卷的「壓卷之作」，馬淵有其特別考量。除份量上，第一卷臺灣、第二卷印尼，以及第三卷置入沖繩比重較多之外，第三卷，還有其他卷所沒有的地方。此即，他交代了學問的脈絡傳承，以及自己之所以成爲一個社會人類學者，以冷眼旁觀兼具熱情投入的方式，分析其一生長跑下來沿途所見周遭風景與路線軌跡。

這是很難得的。人類學這門學問，長處在於觀察別人、分析他者、研究異民族／異文化，卻往往隱藏了自身所在之處。可是，要如何觀察自己呢？這就有趣了，學校可沒有教。在1974年出版這三卷的年代，所謂八〇年代後期的人類學反思、文化研究、倫理檢討等思潮，尚未現身學術舞臺。那時或許已經感受這個道理的馬淵東一，除了在本卷第三部分——學者側寫上，放上了他對三位恩師——移川子之藏、小川尚義，以及柳田國男的追思與分析之外，他還寫了一個看似不起眼的編者〈後記〉。一如客觀的學者，他也剖析自己一生的學術軌跡與脈絡。

試想如果連自己最親近的學術啓發者無力描述分析，同時對自己的一生路徑也難以冷靜解剖，那麼要談這位學者對他的異民族／異文化對象，會有何偉大的研究成果發現，似乎也難說服人吧。

馬淵東一這個「人」

馬淵東一這位學者，是個什麼樣的人？除了可以從他如何分析自己的文章之外，生前與逝後都有很多學生與友人描寫過他，讀者也可以透過周邊的人如何看待他而理解他。

從他自己的描述裡，一些人類學者的特質從小就顯現出來。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馬淵出生在一個職業軍官的家庭，他未談及父母對他的影響，不過卻是因為父親職業，家人必須經常隨父親調職而搬遷。正因為這個緣故使得他在進入大學之前的成長期，在跨緯度甚長的日本的北、中、南各地，都居住過。他的父親本家在九州西南的長崎縣，母親是熊本縣人，這樣說來，應也就是九州南方的家庭氛圍。但他卻出生在中部的千葉縣，入學於關西地區大阪的小學，之後轉回千葉縣，不久又轉到東北頂端青森縣的弘前市，中學時期回到九州南部的熊本縣，直到讀完第五高校（舊制高校，簡稱五高）。

他回顧自己，在大阪剛就讀小學時，因為是陸軍子弟就讀的小學，故特別重視紀律，實在難以適應。還被認為是愛搗蛋、不聽話的小孩，學業成績乙，操行得丙，差點要被留級。後來幸好轉校，成績也轉好。少年時代愛讀各類雜學書籍，能考上熊本的高校，在當年需要極優秀的學業成績。高校時期的1920年代，日本正逢大正民主後期，各類思潮競相而起。他在學風自由的高校，加入了名為「馬克斯主義研究會」的社團，有助於他對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等新觀念產生理解。當時也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國際秩序大重整的時期；從報章雜誌上，歐洲各國國情差異與世界各地族群資訊快速進入日本。青年時期的他，喜歡吸收不同族群文化的訊息，甚至嚮往遙遠的非洲，在自由氛圍下，喜愛與社團朋友進行思想辯論。

他以第五高校的優秀成績，考上了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這本來是很令人稱羨的事，可是看到科目，並不是他這種雜學嗜好者的興

趣，況且東大的人類學講座也只專攻體質測量，非他志向所在。此時他偶然從一篇雜誌文上看到，遙遠的南方臺灣才剛成立一所「臺北帝國大學」，其中的文政學部裡有個叫「土俗學·人種學」講座，裡面有位很酷的移川教授，剛從美國哈佛大學回來，正要前往任教。此時，他回到叛逆本性，就在眾人訝異聲中，放棄了東京帝大，選擇去一個未知的遙遠異地。即就讀臺灣才剛成立的第一所大學學府，一個沒有人知道是什麼名堂的小小學系。

就人類學者的成長經驗中，他回顧幼小時期起，就必需要適應日本各地差異很大的關西方言、東北方言、九州方言等。這些成長經驗，養成了他對語言聲韻的分辨能力，以及要快速適應周遭不同人群集團的文化敏感度。他也交代青年時期，對廣大世界的好奇心以及對各類新思潮的雜食性吸收。

其中最特別的，當然要數他在那個時代的離經叛道行徑：竟然放棄人人稱羨的東京帝大，來到一個未可知的大學就讀。他當時可能不知道，這個新創小講座其實是日本國內最早的社會文化人類學科系，日後臺灣的研究成果，對日本文化人類學界的影響甚大。當然他也無法預知，這個小講座從開創到結束，教出來的唯一學生，也就只有他一人。

在本書〈後記〉裡，他似乎不得不交代他在戰後與日本學界合不來的原因。這要從第一卷〈序文〉說起。對馬淵來說，如此重要的《著作集》唯一序文，即是請與他親近並相交四十年的前輩學者古野清人來撰寫。序文對馬淵的學問有很詳細的介紹以及評價，但很奇特的是，到了最後，卻有一段喊話，希望馬淵東一要回到日本民族學會來，不要一人離群獨行比較好。

馬淵為此，不得不做出回應。為何身為東京都立大學著名教授，有相當國際聲望，並培養出多位優秀的碩博士生，卻做了一件退出學會的叛逆行徑。1958年馬淵對全國各會員寄出明信片，宣告辭任日

本民族學會理事一職，還退訂學會雜誌，他採取這種動作來表達對學界充斥派閥作風的抗議。離開學會，這在當時是頗有風險的行為，表示他無法從日本政府拿到學術計畫經費做研究，也可能使學界人士不敢跟他走太近。一名來自於臺北帝大唯一的畢業生，加上移川教授早逝，缺少靠山背景，如何隻身對抗當時日本社會的學閥氣息？在〈後記〉，他直接解釋了當時對學閥作風的想法，也表露出在學界獨行俠式的孤高個性。

這種不迎合權勢的衝動個性，在學生與朋友的回憶錄中，也屢屢被提及。馬淵的門生松園萬龜雄，就曾說這個老師不是「組織型」的人物，卻像是有個性的「馬淵個人商店」，不喜歡集體作風與體制的框限。¹ 日本敗戰後，有段時期要去海外做田野工作頗為困難。當時的沖繩仍屬美國管轄，若能去沖繩，也就等於是去外國研究異文化，有頗多學生選擇要去沖繩進行研究。1962年東京都立大學好不容易拿到了日本政府的補助計畫，學校讓全體博士生一律加入這個出沖繩田野的大計劃。不過松園說，馬淵從頭到尾，都與這個計畫無關，即便他自己更早從1954年已經先著手進行沖繩調查，翌年1955年發表重要的先島姊妹神論文，包含他後來再來臺灣與印尼的田野工作，幾乎都是用自己薪水（除了曾獲得美國的補助），而且也不做師生共同調查，這些都是在學界頗為特立獨行之處。

1960年末期，日本發生大學學潮，又稱為日本大學「全共闘」學運，當時東京大學以及其他全國各大學生都聯合起來爭取民主。他們占據校園表達抗議，到處破壞各教授研究室。在那個時期，唯獨只有馬淵東一的研究室，不但沒有遭到破壞，反而成為這些學生在校內喜歡聚集之處。這也使他日後成了東京都立大學內的傳奇人物。在晚年（1984）一篇訪談中，馬淵開玩笑嘲諷說自己也算是一種「反日主

¹ 見文末參考文獻松園萬龜雄（2010: 12）。

義者」；意思是他同情學生的立場，表達了對於以自我為中心、中央集權式的社會氣息的反感。²

因此，以他這種有點反骨、又反體制的性格，在殖民地的時期，怎麼可能去迎合當時軍國主義作為。曾經蒙馬淵親炙的松澤員子，於馬淵逝後一篇追思文中替老師抱不平。³ 1980年代後期興起一波人類學田野工作的反省，在日本也掀起一番對殖民地人類學的檢討風潮，當年在舊殖民地朝鮮、華北、東南亞等地的人類學者都受到了檢視與追究。可是，殖民地臺灣多位人類學者在這個風潮底下卻都通過了檢驗，這裡面也包括馬淵東一。

有幾位在臺灣田野跟馬淵偶而相遇，或讓馬淵介紹田野地的學生後輩，都描述過馬淵在田野的情況。末成道男說他在卑南族部落進行田野時，有一天老人家們聚集私語，說好像有位大教授要來。到了那一天，只見馬淵東一走進部落，遇到老人家們，立即熱情地叫出每個人的名字，像是才分開一陣沒見的朋友般親切問候。可是，末成算一算，明明距離他們上次見面，應該是在戰前，況且還經過了三十五個年頭，馬淵怎麼還記住每人的面孔與名字，這讓他佩服不已。

松澤員子也說在部落裡，馬淵跟老友開心聊到深夜似已酩酊大醉，可是隔天一大早，卻總是比年輕人更早起，正襟危坐地整理著昨日工作筆記。馬淵對學生的影響，不止是自己的直屬門生，也包括來自奧地利的金子 Erika。金子回憶她在學生時代，參加戰後首度在維也納召開的國際人類學會時，與會學者告知要研究臺灣原住民，一定得找馬淵東一。那時她提起勇氣寫信請教，沒想到馬淵對這位不認識的國外學生，親切回信並給予指導。末成道男也回憶，自己原本是東京大學的學生，因慕名而擅自跑進去東京都立大學旁聽上課，沒想到

² 見文末參考文獻馬淵東一他（1988: 270-274）。

³ 見文末參考文獻松澤員子（2000: 252）。

馬淵也給予親切指導，一直到晚年都還持續給他學問上的建議。⁴

這些對部落族人、學生、朋友的友善，都讓人感受到馬淵式獨有的親和力；不過，面對學界大教授們，馬淵就不一樣了。他和當時鼎鼎大名前輩教授們有多次直接衝突激辯的場面，又公然宣告退出民族學會，學界多人在背後給他綽號叫：「無法松」。這個名字原本是戰前小說中虛構的人物，後來被翻拍成電影或戲劇多次，成為家喻戶曉人物。劇中描寫的是一個外表魯莽，但內心卻是純情至上的人，這份純情用在馬淵身上，如同對民族學知識求真理般追尋的熱情，還有對道德的單純堅持。⁵

因此馬淵東一固然沒有單行本著書問世，卻在日本有多本書籍或文章在討論他的學問，以及描寫與他相處的經驗。不論在生前或過世之後，他都是個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像這樣魅力獨特的人類學者在日本並不多見。

在他生前，已有三本書談論他的學問與為人：

(1) 1972 年剛從任教時間最久的東京都立大學退休時，《人文学報》87 號就出版了關於他的退休紀念專刊。⁶

(2) 1986 年為時，學生們編輯了《馬淵東一先生古稀記念：社会人類学の諸問題》論文集，除了受他影響的學生們紛紛為文，書後包括宮本延人、國分直一，以及其他學界友人，共有 10 篇撰寫他們所見的馬淵為人與學問。⁷

(3) 1987 年逝世那年出版了《馬淵東一座談錄》(河出書房新社)，不過內容都是其生前在各類學界刊物登載過的，與多位民俗學、社會

4 上述軼事引自見文末參考文獻 2000 年《台灣原住民研究》第一次掃墓特集。

5 見文末參考文獻西村朝日太郎 (1988: 335)。

6 本號在臺灣圖書館似無收藏，筆者行文至此尙未能讀到。

7 日本社會為祝七十歲之壽，稱為「古稀」祝壽或紀念，取義中國杜甫古詩「人生七十古來稀」。

人類學者們深入對談的紀錄。

另外，在馬淵過世之後曾有三本緬懷的特集，外加一本專著深入分析他的為人與學問的，分別是：

(1) 日本民族學會《民族学研究》53卷3期，1988年出版了追悼專輯。雖然馬淵長期退會，可能後來復會，又由於他的影響深遠，許多朋友、學生仍寫了多篇懷念他的事蹟。

(2) 《台湾原住民研究》第5號（風響社），馬淵過世後十三年，於2000年出版「特集・馬淵東一先生墓參」，收錄了5篇學生輩對他的紀念文。

(3) 林修澈、王雅萍編，2009年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出版《原教界》30期內編有〈第二屆台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馬淵東一的學問與台灣原住民研究〉專輯，也收錄了多篇臺日跟他有緣相處的朋友與晚輩們的追思文。包括受過他指導的阿美族學者黃貴潮，還有在花蓮池上鄉跟他有深交的高家說的故事。而笠原政治的日文版報告則刊載於2010年《台湾原住民研究》第14號。

(4) 上述論壇舉行後，笠原政治把多篇論文編成專書，於2010年出版了《馬淵東一と台湾原住民族研究》（風響社）。其中有更多馬淵的學生與學孫輩們對馬淵的闡述與研究。

算一算，上述加總起來已經有七、八本，另外還有幾本「日本人類學史」的專書，也特闢一章討論馬淵的學術貢獻。例如：綾部恒雄編，1988年出版的《文化人類学群像3 日本編》，這本書追溯日本人類學成立百年來，最具有影響力的人類學者二十二位，其中，以臺灣研究起家的人類學者就占了六位，馬淵東一也在其內，臺灣研究對日本人類學的重要性可見其一斑。此外，山路勝彥編著於2011年出版《日本の人類学——植民地主義、異文化研究、学術調査の歴史》書中，也特別闢一篇章討論馬淵東一的學術成就。

有趣的是，這些文章或專輯，都喜歡用「人與學問」這類的標題，

好像要談馬淵的學問，也必須非得談他的人一樣。因為這個「人」實在很特殊，太令人難忘。

在生命旅程的最後，馬淵又做了一件令人意外的舉動。他竟然遺言交代，務必要把他的骨灰，葬在其最愛的臺灣土地上。也因為這個願望，使得他人生的長跑路程，比別人又要多了好幾里路。他去世之後，希望骨灰還常伴隨著田野裡所交往的朋友們，而學生家人要來掃墓，也必定非來臺灣不可，無形中使得大家得要繼續認識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

或許他有先見之明，知道逝後，會有很多人繼續討論他，不論是褒或是貶，他交代在墓碑上只要刻著「馬耳東風」四個字即可。此處又呈現他一貫的幽默，表示不在意。事實上，他的傳奇與事蹟，似乎說也說不完。

馬淵東一的學問起家厝與續航力

臺灣的人類學發展，早期在兼帶有學術探險精神的天才學者揭開精彩序幕之後，後續統治初期因多族群共處的衝突，而付出了重大戰爭代價。但同時在該時期，日本官方調查事業深入各地，1910年代完成二十七巨冊的舊慣調查研究成果。在這些深入的調查之後，1920年代臺灣進入文官統治時期，實施近代化教育，並在眾人期盼下，於1928年設立了臺北帝國大學，反倒比日本本土的大阪、名古屋帝都還要早。爲了在臺北設立帝國大學，總長幣原坦必須對中央訴求必要性，其中之一即是多族群共處的臺灣，必須有的特色科系之一，即文政學部史學科下的「土俗人種學講座」。

講座名稱說起來有點拗口，被通稱爲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英文的名稱在出版物上卻稱 Institute of Ethnology，照理說應翻譯爲民族學，有時也寫成土俗·人類學研究室，有時口語稱爲教室。講座名稱有混用現象，表示這門學問還在初始階段，名稱仍有可能變換。不過

該系確實是全日本第一所偏向文化的人類學系，接近綜合型的美式作風，其研究內容包括了文化人類學、民族史、考古學、博物館學等，有別於先前成立的帝大體系，東京帝大以體質人類學研究為主，京都帝大則以考古學為主。後來的成果顯示，臺北帝大講座研究的建樹與成果都很豐碩，令人訝異的是在規格上，其實只配置了一名教授，一名助手，而且只有一名學生馬淵東一來入學，師生三人撐起一個學系，算是文政學部中最弱小的科系。

配屬這個弱小科系唯一的助手宮本延人回憶，他從日本慶應義塾名校剛畢業，來到臺北，建築物都還沒蓋好，只能借用臺北高等農林專門學校的部分房間來當成校本部使用，四周草叢漫漫，在孤單的一棟建築物內，幾無研究經費，前途未卜，他內心甚為不安。開學後不久，眼前出現一名身穿和服、腳踏木屐的青年，落落大方自我介紹他來自日本九州，聽說這裡有位知名大教授，特地要來跟他學習。宮本一聽心中竊喜，不由得對自己所跟隨的移川教授心生敬意，似乎算是有點知名度。而且這名青年不僅熱心學習，平常也很積極來幫忙宮本做做整理標本、搬運圖書等等雜務。

這名學生在大一的途中，幸運地遇上移川教授要去蘭嶼做田野的機會，於是頭一次田野實習，就前往文化與本島原住民大相迥異的遙遠小島。這次蘭嶼之行不僅師生三人總動員，還巧遇鹿野忠雄也在島上，鹿野是一名愛好蘭嶼的天才學者，二名青年惺惺相惜，相談甚歡。加上正好馬淵需要替補「蕃童教育所」老師出差的空檔，因此讓他有機會在島上與雅美族人相處更久的時間。後來馬淵常說，生平第一次出田野就在蘭嶼遭遇的異文化體驗，讓他對人類學田野工作產生了一輩子的愛好。

《著作集》三卷中，尤其是本卷，收錄了多篇馬淵對於他的學問原點——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的回憶；讀者也可透過馬淵的眼睛，探知當年這個小學系的真實情景。他對恩師移川子之藏教授

個性描寫更是一絕，移川本來志願是藝術史，從高中就去美國，長年留學下來習得人類學歷史學派真髓，但是外表上卻仍喜歡穿著日本和服，沒沾染到洋派博士的架子。他論起學問總是要從源頭開始講起，一講就超過時間，無視下課時間已過很久，且不在乎截稿與上課的時間與形式，經常令人替他著急不已。但是移川確實有滿腹學問，不僅上課，對外演講也一樣，無視時間，只重視實質內涵。所以馬淵青年時期常往教授家跑，在滿屋煙味「燻」陶下，與教授討論學問直到過了深夜，像這樣課外受教的體驗，獲得的真傳更多。

在剛成立的小校裡，他的第二個恩師是「言語學講座」的小川尚義教授，言語學講座其實還更小，只有一位教授，連一名助手也配不到。本卷收錄了馬淵對小川尚義的一篇追悼文。文中馬淵描述小川治學態度嚴謹真誠，淡泊名利。馬淵對他長年在日本語言學界所做的開拓性貢獻，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甚感不平。小川尚義原本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來臺甚早，就在 1896 年底，正逢芝山巖六士先生遭殺害事件之後，小川不懼危險，毅然來臺。且就在臺灣人聚落的萬華，借得一間小寺廟，隨意鋪上草席住下來，開始對臺語進行研究。他不僅很快對臺灣的閩南語研究著成《臺日大辭典》，對原住民複雜困難的各族語也有深入研究。馬淵也看到當時和小川一家交情甚篤的泰雅族語教師 Yayut Bilieh，她即是帶著刺青就讀第三高女的泰雅傳奇女性教師。馬淵寫她頻繁出入小川家，如家族般親近往來。後來臺灣總督府出版的《排灣語集》、《泰雅語集》、《阿美語集》等，主要都仰賴小川的研究，當然這也是因為他能得到部落族人全力協助之故。

不僅如此，小川對其他語言的研究也有很多發現，馬淵從他習得對印尼語以及原住民各族語言特性的理解，這有助於他大學畢業後在帝國學士院覓得一職，也開啓往後對印尼的田野調查，包括荷蘭在印尼的舊慣調查事業研究。他感謝小川給他學識滋養，他也看到如此重要學者，1936 年退休回到四國松山家鄉後，大部分語彙資料雖留在

臺北帝大，即令老年視力茫茫仍每日汲汲於研究。歷經敗戰後困苦時光，小川晚年貧窮潦倒到一家六口人只能擠身睡在農舍穀倉的樓上。而移川子之藏也因敗戰，1946年留下在臺的家屋財產與多年收集的學術資料，帶著家人經歷遣返苦難，翌年年初，隨即辭世。

回想起這兩位帝大時期的栽培恩師，為表感謝，馬淵東一將《著作集》三卷著作獻給移川子之藏、小川尚義以及戰後引導他進入沖繩研究領域的柳田國男這三位老師。其他關於臺北帝國大學當年的情況，除了本卷另收錄《南方土俗》雜誌復刊的序言，還有先前第一卷收錄的〈高砂族的社會人類學〉論文，以及《馬淵東一座談錄》，及與宮本延人等著《台湾の民族と文化》一書的對談，這些回憶都講述了臺北帝大的小講座在學術史上的意義。這都是來自講座唯一的畢業生馬淵東一在現場的第一手證詞報告，也是要理解臺灣人類學發展史的讀者必讀之文。

這兩個支撐起臺北帝大對族群研究的講座雖小，但志氣與本領卻都很大。在兩位教授帶領下完成了《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及《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二大巨著，其範圍涵蓋全臺原住民族，如此成就得到日本「帝國學士院賞」與「恩賜賞」的肯定。說起來，資助這二個講座的研究經費，既不是來自政府，也不是大學，而是來自臺灣總督上山滿之助的個人奧援，這是在他任期結束歸國時各界給他送行的退休金，他希望將此美意挹注於原住民的研究上。這份及時雨讓臺北帝大兩個講座得以施展田野工作，而馬淵1931年畢業後，也恰逢其時成為計畫專員，全力投入。

在系統所屬相關的研究裡，師生三人展開對涵蓋臺灣原住民九族與眾多歷史古老的源頭部落的大規模源流分疏之記錄工作。移川教授當時也擔任了文政學部部長的行政工作，所以調查主力便落在馬淵的身上。他對泰雅族、布農族、鄒族、魯凱族（部分）、排灣族（部分）、卑南族、阿美族等的田野調查中，又以阿美族所占比率最高。後來分

析發現，事實上馬淵東一跑遍了七個族群，貢獻占了全書三分之二頁數。⁸ 他所調查的各族群系譜，以當時報導人的年齡推算，應該都是十九世紀中期以後出生者，亦即是臺灣的原住民還沒有受到日本及外力影響的世代，他們對自身的歷史尚有完整的記憶，而馬淵適時且忠實地給予記錄下來。馬淵也寫道，出版後帝國學士院所賜予的獎賞金，移川教授全數分給了宮本與他二人，自己分文未取。

在這段期間，馬淵從兩位帝大教授身上受到完整訓練，藉由掌握各部落的歷史關係與各地語言特性，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如初生之犢不畏虎，行走於臺灣山地與平原的族群部落當中。他常借住理蕃警察的宿舍，1931、1932年也正是霧社事件發生之後的年代，山區情勢並不穩定，理蕃行政正面臨大力改革。馬淵住在宿舍裡，看到了理蕃警察家族的生活面向，不僅身兼治安、教育、公衛、農事等工作，他認為警察夫人們對部落女性的教育及貢獻，也應該要記上一筆。

馬淵在帝大期間，就開始在學系出版物《南方土俗》發表論文，不論是噶瑪蘭、鄒、布農、巴宰、排灣、阿美、太魯閣等各族，都有涉獵，畢業論文以阿美族的分灶為課題。畢業後，直到從事的系統所屬調查於1935年出版後，他持續田野工作，到該年底，才離開居住了七年的臺灣。

1937在帝國學士院覓得工作，為編纂《印尼慣習法辭典》，馬淵於1938年又可再度來臺研究，這段時期他也被委託收集日本民族學協會的附屬博物館所需的文物，也包括考古學物質文化的石鋤等調查，也短期在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上班，直到1940年，其間他花費許多時間，在中部布農族、鄒族地區進行田野與收集文物，多篇關於布農族的重要論文即是在這段期間陸續發表。

1943年成為臺北帝大南方人文研究所助教授，之後去印尼蘇拉

⁸ 見文末參考文獻笠原政治編（2010: 85-86）。

威西島（當時稱 Celebes [西里伯斯]）與爪哇島展開田野工作。1945年日本迎來了敗戰，當時馬淵人在雅加達。至於他是如何回到日本，其經過不太清楚，只知戰後回到日本，一切從零開始，生活困頓；借住在好友家的馬廄，即令如此艱辛，他仍不惜購買昂貴的李維史陀大作，且積極參加各類研究會，勤奮發表論文。輾轉幾間私立學校之後，1950年幸運認識了柳田國男，推薦他去沖繩做田野工作，讓他戰後開展了另一大田野工作地，範圍涵蓋宮古群島與八重山群島。

1953年成爲東京都立大學教授後，馬淵的職務總算安定下來，直到在該校屆齡退休。後來再到琉球大學與南山大學任教數年，直到1977年完全退休。他的教師生涯作育了戰後人口最興盛期的人類學英才，這些學生們又正好在高度經濟成長時代就職，前往新擴增的日本全國大學相關科系，繼續開枝散葉。

回顧馬淵東一著作的年譜紀錄，會發現他在臺灣原住民研究的田野與重要論文發表，都在戰前打下了深厚的基礎。而他對於南方菲律賓、印尼諸島，與戰後才開展的沖繩南方先島群島，乃至於太平洋研究的犀利視點，也都常以他所熟知的臺灣原住民社會文化爲比較基礎，並在系譜源流、傳說、親屬稱謂結構與宗教祭儀、時間與宇宙觀的課題上交互比較，由此激盪出更深刻的認知與發現。綜觀其畢生，以一己之力，研究對象從臺灣原住民各族群出發，能擴散到如此眾多的族群與島嶼，必須有驚人的毅力與熱誠。他留下來的成果，不止持續對這些區域的社會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甚至民俗學、語言學、考古學、博物館學等領域皆能十分受惠。

人與人：臺灣人類學與日本人類學

在馬淵東一逝後，其家人將他生前縱橫各地所留下的百餘冊詳細的田野工作筆記，加上原稿、相片、影印資料與三千多冊藏書，全捐贈給大阪的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簡稱「民博」）收藏。民博成立

於 1970 年，當時藏品的臺灣原住民文物部分，即來自於早期的民族學協會附屬博物館，也就是馬淵東一於 1938~1939 年在臺灣所收集，共有 379 件的文物，分別來自於屏東魯凱族以及太魯閣、賽德克、卑南、阿美、排灣、布農、鄒等族，還有田野筆記、附記。民博為此特別設立「馬淵文書檔案」(Mabuchi Archives)，公開於網站可查閱目錄。

後來國分直一與野林厚志也發現，不止是民族學的標本，馬淵在臺北帝大時期，許多博物館的收藏品還包括了多件考古學標本，也是馬淵費心盡力帶回或請託耆老製作所得，至今仍留在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意即，馬淵這位 Made in Taiwan 的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畢業的唯一學生，並未辜負眾望，他讓臺灣原住民的文物與原住民研究所得的知識，從臺灣推向日本與國際學界。

人無法決定出生地，卻能決定埋骨地。馬淵東一的最後遺願，是希望把骨灰葬在最愛的臺灣某處「石楠花開的山丘下」。不過，到底是哪裡，後來家屬動員了臺灣友人對照田野筆記，花了兩年尋找，才確定地點。經確認後，卻發現這個地點位在極為偏遠的深山處，光是行走腳程得花三、四天才能抵達，很不容易立墓。於是家人請託與馬淵有深交的花蓮池上阿美族高家，將馬淵之墓葬於他同輩也是摯友一旁。而高家後人們不僅記憶也珍惜家族長輩們曾與馬淵共處的時光，還年年幫他掃墓。

依照日本習俗，人過世後會為逝者做一年、三年、七年與十三年忌日，邀請親朋一同悼念。就在十三年忌日的 2000 年，他的學生輩們相約從日本各地趕來，在臺灣的部落族人、學界好友們，一同聚集三十多人，前往池上掃墓，卑南族人林志興當場吟誦一首感人詩作。原本十三年忌之後，紀念規模縮小到家庭之內，不會再擴大。沒有想到 2009 年恰逢馬淵百歲冥誕，這次由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主辦，在臺東的國立史前文化博物館內舉辦為期二天「探討馬淵東一的學問

與臺灣原住民研究」論壇。這次論壇出席了近百人，有三場專題演講（松園萬龜雄、楊南郡、馬淵悟），與多篇論文發表，包含來自日本與臺灣各地與多領域的學者們，皆聚集一堂來探討馬淵直接或間接廣為延伸的學問觸角。

當馬淵東一的公子馬淵悟演講完後，隨即把在家中發現的父親生前未發表的論文〈布農族與鄒族的親屬稱謂之(二)〉之手稿，捐給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收藏，表達感謝心意，讓主辦單位與全場來賓十分感動。筆者有幸參與最後一場「追憶馬淵東一老師」論壇忝為主持，出席者皆為年屆七十多歲的馬淵的學生（植松明石、齋藤 Michi 子、小川正恭與家族等松春夫），他們還講起與馬淵生前相處的趣事，讓更多人理解他獨特的人格魅力。

論壇結束後，翌日筆者也一同前往池上，參加馬淵東一百歲冥誕的掃墓活動。無論認識或不認識馬淵東一的年輕師生們，一行將近五十人，在傳說中的「馬耳東風」墓前，聽阿美族高家人說了許多與馬淵交往的故事。對於一生長跑下來所追求的社會文化人類學，馬淵自己也形容這門學問「諸行無常」而難以捉摸，卻由於他的努力，促成如石楠花開般，許多小花結成一大花叢的溫馨場面，連結了更多人與人，學問與族群之間堅定的情義關係，應該是對一生鞠躬盡瘁的馬淵東一最大的回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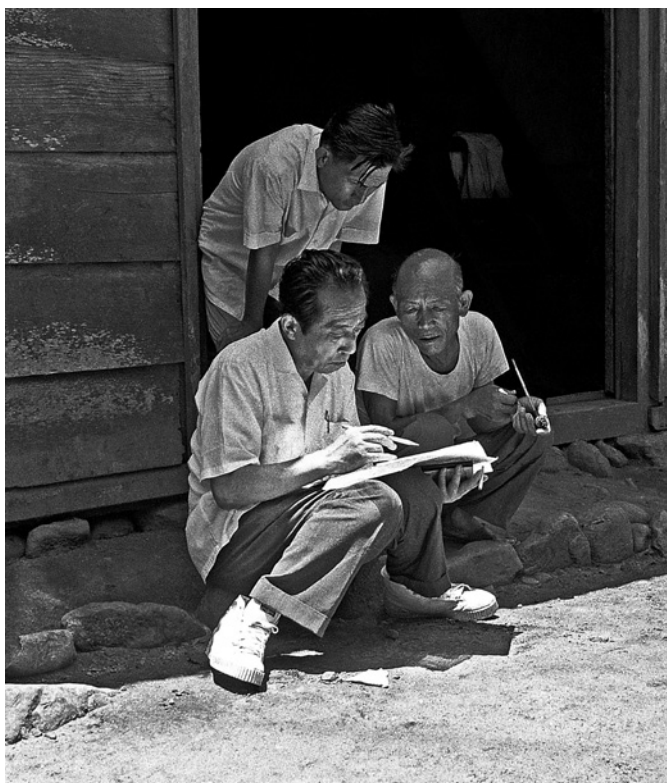
馬淵東一與中研院民族所

話說回來，本卷〈後記〉最後，馬淵感謝了在學術研究上照顧過他的機構，分別是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研究室、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東京都立大學社會學・社會人類學研究室、史丹佛大學行動科學高等研究中心、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以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讀到這裡，筆者不禁好奇，馬淵跟中研院民族所又是什麼關係？

戰後長久一段時間，因政治因素，臺日民間不能互相往來，原住

民所居的山區也因管制入山證而受到嚴控，無法自由進出行動。所以，回顧戰後馬淵的田野工作，其實大部分是去沖繩或印尼諸島居多，直到隔了近二十年後才再度來臺。他再回臺的田野，總共只有三次，分別是 1964 與 1967 年，都是先往沖繩而延長到臺灣。最後一次是 1970 年，這次專程只來臺灣，所待時間最久長達半年。

就在這一次，中研院民族所還仍處於草創時期（創於 1965 年），由凌純聲擔任第一任所長，馬淵來到民族所訪問，有數個月居住在學人招待所的蔡元培館。碰巧也在中研院訪問的鈴木滿男及土田滋兩人都還在學生階段，尚未決定研究方向。鈴木很幸運地短暫跟隨馬淵去到南投久美村，進行鄒族與布農族的田野工作，留下當年珍貴的照



馬淵東一於
南投久美部落
進行田野調查
（鈴木滿男攝
於 1970 年）

片，也記錄了當時馬淵在民族所內與劉斌雄、劉枝萬二位學者有深入交流。⁹

這也解釋了為何馬淵曾撰寫一篇關於臺灣中部原住民的宗教土地所有權的英文論文，1970年刊登在中研院民族所出版《民族學研究所集刊》29號凌純聲所長榮退專號的緣由。該文日後被翻譯回日文，收錄在本系列《著作集》第二卷。1988年馬淵逝後，日本民族學會學刊《民族学研究》53卷3期紀念號上，也有一文來自中研院民族所的劉斌雄，文中還很認真地持續跟馬淵討論親屬稱謂的問題。2000年去臺東池上掃墓時，民族所林美容到場，2009年那次掃墓筆者有幸參與。最終，馬淵一定沒有想到，他的《著作集》四卷乃是最後一次回來臺灣時，所連結到的中研院民族所，幫他全部翻譯為中文。

本書第三卷的翻譯由李蕙霽、馮秋玉、黃淑芬共同攜手完成。馬淵的文章寫作，也像他本人風格，如勇往直前的開路先鋒，在前人尚未行走過的崎嶇路上，爲了要精準到達目的地，必須嘗試上下左右繞行的迂迴路線，他才能告知讀者，途中會遭逢的陷阱與前方將至的美麗遠景。這份學術的厚重底蘊，使得他的用字遣詞相當晦澀而難以準確翻譯；更何況牽涉區域廣大，時間軸久遠，全部四卷翻譯能夠順利完成，多虧各卷主編群：楊淑媛、蔣斌與滿田彌生的毅力與用心。期待中文版問世，有更多後輩晚生，廣大中文讀者，皆可親近馬淵東一從臺灣出發，面向世界，畢生追求的人類學志業之軌跡。

黃智慧 謹識於民族所
2021年10月

⁹ 見文末參考文獻鈴木滿男（2000）。

參考文獻

小川正恭

1988 馬淵東一——「オナリ神」の社会人類学。刊於文化人類学群像3 日本編，綾部恒雄編。京都：アカデミア出版会。

2010 「ズレ」の探求——エクステンシブな調査方法をめぐって。刊於馬淵東一と台湾原住民族研究，頁55-80。東京：風響社。

大林太良、劉斌雄、土田滋、松澤員子等

1988 馬淵東一教授を悼む。民族学研究 53(3): 329-345。東京：日本民族学会。

山路勝彦

2004 「梁山泊」の人類学、それとも？——臺北帝国大学土俗人類学研究室，《台湾の植民地統治——「無主の野蛮人」という言説の展開》，pp.205-235。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

2011 馬淵東一と社会人類学。刊於日本の人類学——植民地主義、異文化研究、学術調査の歴史，頁299-341。西宮：関西学院大学出版会。

日本順益台湾原住民研究会編

2000 特集・馬淵東一先生墓参。台湾原住民研究 5: 245-285。東京：風響社。

西村朝日太郎

1988 馬大人と『土籠叩き』。民族学研究 53(3): 334-335。

林修澈、王雅萍編

2009 原教會議：第二屆台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馬淵東一的學問與台灣原住民研究。原教界 30: 54-87，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松園萬龜雄

2010 馬淵東一の流儀——台湾調査とその後の展開。刊於馬淵東一と台湾原住民族研究，頁37-54。東京：風響社。

松澤員子

2000 墓前にて馬淵東一先生を偲ぶ。台湾原住民研究 5: 250-252。東京：風響社。

宮本延人、瀬川孝吉、馬淵東一

1987 台湾の民族と文化。東京：六興出版株式会社。

馬淵東一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編集委員会編

1986 馬淵東一先生古稀記念：社会人類学の諸問題。東京：第一書房。

馬淵東一他

1988 馬淵東一座談録。東京：河出書房新社。

笠原政治

2010 馬淵東一先生の生誕百年を迎えて：第2回日台原住民族研究フォーラムの開催。台湾原住民研究 14: 162-172。東京：風響社。

笠原政治編

2010 馬淵東一と台湾原住民族研究。東京：風響社。

鈴木満男

2000 馬淵東一先生と私。台湾原住民研究 5: 260-285。東京：風響社。